

台湾学术丛书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李孝悌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义顺班的名伶崔灵芝公演梁济编的《桑露战记》和《女子爱国》。

三天演出的戏资全部捐出。

给湖北蕲水县的困范学堂。

热心的名票乔芝臣也不落人后。

和李毓臣两人邀请了京师的一批票友。

在福寿堂演两天义务戏。

所得款项一部分捐给北京的济良所。

一部分则捐给上海公学。

过了两个月。

又有西城八角鼓团体在福寿堂为女学募款。

由绅士孟艺斋创办的宏育小学堂。

在一九〇八年也因为经费不足。

募准在东门外二闸一带。

搭建戏台。

演文明戏曲。

筹募助学。

而孟氏援引的则是一九〇七年建棚演戏助学的成案。

这个例子说明至少在北京一带。

演戏助学已不是什么特例。

不光是惠兴兴学之类喧腾一时。

举国皆知的个案能赢得名伶的注目。

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堂。

也可以在野外搭一个台子。

请一些不知名的演员。

为文明的设施尽一份“文明时代”下的戏子所该尽的一点义务。

更进一步。

还有伶人直接出资设立一般的学堂。

譬如一向热衷启蒙事务的潘月樵。夏月润就借上海梨园公所成立了一间棘萼初等小学堂。

教授国文、算术、体育、手工、外文、唱歌等课程。

在苏州。则有伶人夏云峰等人同样借用梨园公所设立菁莪小学堂。

学校的经费由演员捐认每星期日戏资所得来支助。

在这个启蒙的风潮下。

办学堂可以说是趣中应有之意。

而在学堂中。不仅要传授各种现实实现的新知。

体育活动也日渐受到重视。

和所谓的“兵操”（“军操”）一样。

体育被视为强身、强种、强国的重要基础。

是新时代的国民（特别是学生）必须重视的课程。

在这一方面。

移风乐会的刘子良领先群伦。

他在一九一一年。

和其他十几个发起人。

邀请京津著名角色。

在丹桂园唱义务戏三天。

发起人、戏园及各个名角均分文不取。

所得款项悉数捐给体育社作为经费。

除了这些用途。

义演所得有时也用来支助戒烟活动。

上文提到的普仁戒烟会。

前后主办的几次义演。

除了一部分捐给一九〇七年江北水灾的灾民外。

多半还是用在戒烟会的维持上。

台湾学术丛书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
运动：1901-1911

李孝悌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台湾学术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5434-4302-3

I.清… II.李… III.平民-民主运动-中国-1901~1911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530 号

书 名 台湾学术丛书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作 者 李孝悌

责任编辑 刘 辉

装帧设计 刘 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67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02-3/1·607

定 价 18.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不该为区区海峡所隔绝。可很长时间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海峡两岸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分途发展，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这种局面，目前已有很大改观。两岸学者的你来我往，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对各自的学术思路及发展路向，双方也都有相当的了解。由此而引发相互间的借鉴、补充乃至竞争，对学术的正常发展，均有益无害。

可惜的是，虽然大陆的学术著作早已纷纷登陆宝岛，台湾学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大为大陆学界所熟悉。关键在于，与各种“台湾文学丛书”此起彼伏形成鲜明对照，大陆出版界明显冷落了台湾学人的创造性劳动。这就难怪，除了私人馈赠及大图书馆的少量收藏，大陆学界难得一见台湾同行的著述。

厚重的专业著述，固然不及轻灵的流行歌曲

8-281/08

或散文、小说读者面广，可更能体现一时代一区域文化人的社会关怀、历史意识以及哲学思考。完全撇开台湾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很难理解今日台湾的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与经济。

打破长期的隔阂，让台湾学者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资源也能为大陆知识界所共享，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本丛书希望积以跬步，先从目前活跃在台湾学界的中生代入手，逐渐推广扩大，使之成为展现五十年来台湾学术建设的窗口，也为日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方便。

本丛书的选目，暂以人文研究为限，希望兼及在台湾学界已经产生影响与在大陆学界可能发挥作用的著作。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路数，则不问新旧中西。

为方便大陆读者，各书附录作者的问学经历及著述年表，以便有心人按图索骥。

陈平原

1998年8月5日于边陲旅次

大陆版序

虽然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根据的是细琐的实证资料，但写完后，却颇有一种无中生有的感觉。书中描写的事情，都实际存在过，也被报导过，但经由资料的串连、编织，而出现这样的图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中国史是我的专业，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事离今天也不算太远，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遥远的南港研究室中闭门造车的过程，仍然是不真切地，对异时异地的一种想像。现在我想像的这幅图像，有机会在被描述的对象所从出的地方，接受在地人的检视，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其荣幸的事。

书后附录的文章，《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从清末的白话文谈起》一文，原收于《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1991），是为一次关于胡适的会议所写。文中的资料后来多半写入本书，但因为立论的角度不同，希望还有一

些参考价值。《从中国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一文，原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所^①集刊第十九期（台北，1990），是为我的英文博士论文所写的导论。现在收在这里，希望能当成本书的一个更大的背景介绍。

我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教授，因为他们的好意和多方协助，这本书才能顺利地在大陆印行。

李孝悌 于台北南港

1998, 12

^① 本书中出现的近代史研究所、欧美所、史语所等，均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下属研究所，后面不再一一标注。——编者注

再 版 序

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些同事们常常调侃我是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社会的专家，却又表现的不够普罗，很多时候对大众文化也没有真正的认同。比较严肃一点的，则从认识论的层次，对像我一样的大众文化研究者，是否能真正进入下阶层民众的思惟世界，有所质疑。后面这个问题，在后现代思潮和新兴的 subaltern studies 中，都是相当中心的议题。这样的质疑，对一向相信人性的普遍性，或经验、情境的一致性、客观性，并因而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进入另一个文化、另一个阶层或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天真乐观的想法，当然是有极大的警惕、针砭功用。但我自己却不愿在认识论上采取这样极端的立场，虽然这种对人的孤绝和完全疏离的情境的描写，颇有几

分悲壮、苍凉的诗情。^①

我在过去十几年内，一方面受到孔复礼 (philip A. Kuhn) 教授等人的影响，一方面出于自己的喜好，对社会史和文化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兴趣。但在这本书里，却没有真正以下层社会为研究对象。上述的调侃与问题，虽然都有意义，严格说来，和本书所处理的课题，并没有什么关连。我虽以下层社会为书名，处理的却是下层社会如何被广义的知识分子作为改良对象的经过。换句话说，我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过程。在这个知识由上向下传播的过程中，精英分子的理念经过简化乃至曲解，民间文化的信仰、传说也被新的创造者所采撷，这种上下交融的结果，显然有助于知识的传布。^②更重要的，则是启蒙者对媒介形式和场合的重视，从白话、宣讲、讲报、演说、戏曲到阅报社、半日学堂和茶馆，我们看到上、下层文化的交涉如何达到一个空前频密的地步。

社会史家对各种形态的组织，不管是正统的家族、团练或市场，非正统（或非法）的武装叛乱团体、宗教结社，或游走

① 在最近的一本论著中，Hershatter 藉著对二十世纪上海等地妓女的研究，提出我们是否或如何能够进入下层、被压迫者 (subalterns) 的世界的问题。见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我在对这本书的中文评论中，对 Hershatter 的看法有简单的介绍，见〈评介《危险的逸乐：二十世纪上海的妓女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五期（近史所，1997年8月），页243—245。

② 对这一点，我在博士论文“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 1901—1937”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中有更深入的分析。

四乡的拳师和教派领袖的研究，大大地开拓了我们观察中国历史的视野，也对我个人有相当大的影响。^①这本书虽然看似一个文化史的研究，但处理的其实是规模广泛的社会运动。我原本希望能对运动的组织层面做更有系统的分析，但一方面因为资料选取散布全国，一方面因为运动的性质在开始时有相当强的自发性，组织运作的痕迹也不那么明显，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的不是有系统、有层级的社会组织分布，而是文化传播媒介和形式的层级性分布。

但到这个运动的后期，已可见国家力量的介入。这种一方面由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地方士绅、戏曲演员自动发起，一方面因为国家、政党、军队的介入而变得制度化、组织化的情形，到民国年间变得更明显。原来以“开民智”为目的的启蒙运动，也因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成为战斗意味强烈的文化动员和政治宣传。^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民间社会与国家，自发性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和革命精英的冲突与互动。^③当然，经由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去观察一个文化史的议题如何染上社会史的色彩，无疑也是新鲜有意思的尝试。

一位评论者在书评中，^④特别提到我对 civil society 和国家

① 可参考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及再版序言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North Rural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这些我在博士论文中都有比较详细的处理。

③ 见 W. K. Che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 4 (November 1993), pp. 984—985.

④ 见 Duara, 前引书。

的关系的看法，我觉得有稍加解释的必要。对亲身经历过台湾八九十年代汹涌的政治、社会运动的人来说，我们会给予 civil society 多么高的评价，也是可以轻易想见的。不过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脉络下来看，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Duara 的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理论，指出民国时期各个政治势力不断扩张的结果，反而加速了乡村既有社会结构及文化网络的崩溃，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极有洞见的观察角度。

不过，我仍然认为在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在各种基础建设，以及本书所关注的民众教育上，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对所谓民族国家的看法，并不像黑格尔那么简单乐观，认为是自由、理性的最高体现。

Foucault 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者所不断攻击的“国家机器”对个人的全面掌控，以及透过一个绝对中心的思想、教育机制，经由纪律、惩罚、制约而将个人驯服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对民间文化、普及教育及宣传机构的掌握中，有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不过这样的结果，并不能否定在一个文盲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社会，国家在教育（而非教化）上所应扮演的角色。同样的现代式普及教育的手段也许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虽然解构主义者连对西方式的普及教育也存有质疑），但仍不足以否定国家在其中所该扮有的角色。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否出现过 civil society 这一回事，西方学者有过激烈的争辩。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纪初，即使没有出现过制度性的与国家相制衡的“公民社会”，但民间各种蓬勃的自发性活动，其性质很显然的已经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别。这样一个“民间社会”的出现，不只在清末和民初

的历史脉络中有意义，放在1949年之后权力国家的形成，以及各种社会势力——不管是传统的“士绅社会”，或我在本书中所谓的“民间社会”——土崩瓦解后的情势中来考量，也应该有更多让人省思的空间。我想W. K. Cheng教授的评论应该也是从这样的关怀出发的，所以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一些解释。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他的意见和毫不吝惜的称誉。

本书出版后，欧美所的赵绮娜教授，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班的川岛真先生、王诗伦小姐等人，或是指出书中的错误，或是提供意见，谨此致谢。我也要谢谢张艺曦先生、宋秉仁先生、蒋竹山先生、吴凤莲小姐协助校读文稿、制作索引。由于近史所出版委员会和吕芳上所长的慨然应允，特别是张力兄和公小颖小姐的多方协助，本书才得以修订再版，我要特别向他们致谢。

这样一个尝试之作，能得到前辈学者的肯定，对我来说，当然是一种鼓舞。我尤其要感谢刘广京先生慷慨的鼓励。各地的师友不吝给予支持，我虽不及在此一一致谢，却不敢或忘他们的情谊。

李孝悌 于南港

1998年2月

自序

前年秋天，我在翻阅有关清末戏曲改良的资料时，陆陆续续看到一些新鲜而有意思的记载。没有多久，我开始觉得这些零散的资料后面，也许蕴藏着什么有意义的讯息，所以暂时搁置手边正在进行的计划，开始仔细地阅读当时的报纸。读了几年份的报纸后，我确定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报导，其实共同反映出一个新的时代动向。进一步的爬梳，使这个时代动向的面貌益发清晰，所以我决定将它勾画出来。

本书的主要重点当然是利用一些以前不大受到注意的资料，为清末十年的历史增加一个新的面相。但除了这十年努力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外，我同时也要强调这段历史和日后各项发展的关系。我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主

要题旨。为了救亡，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被重新估量，而使得此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史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风貌。

本书完稿后，王聿均、陶英惠、张朋园、王尔敏、陆宝千教授曾细读全文，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谨在此致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要谢谢王树槐教授给我的一些建议。陈永发、熊秉真、游鉴明、朱浣源、何萍以及秦博理（Barry C. Keenan）教授等人，或是提醒我注意某些资料，或是提供我一些具体的建议。吕慧慈小姐协助整理杂乱的原稿，江淑玲、吴凤莲、李慧玲、张珍琳、庞桂芬小姐帮忙校对文字，均在此一并致谢。另外，我要特别谢谢魏秀梅小姐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各项热心协助。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亲。

199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白话报刊与宣传品	(17)
第一节 白话报刊	(17)
第二节 其他类型的白话文	(35)
第三章 阅报社	(48)
第四章 宣讲、讲报与演说	(65)
第一节 宣讲与讲报	(67)
言论倡导	(67)
实 行	(70)
第二节 演 说	(93)
演说的倡导	(95)

演讲者的训练与培育·····	(103)
演说的场合与地点·····	(107)
演说的内容·····	(114)
第三节 结 语·····	(150)
第五章 戏 曲 ·····	(163)
第一节 戏曲改良的理论·····	(163)
第二节 改良的组织与个人·····	(185)
第三节 演 出·····	(191)
义务戏的演出·····	(193)
劝戒恶俗·····	(201)
推介爱国思想与新知·····	(211)
戏曲与革命·····	(221)
第六章 结 论 ·····	(234)
附录一	
胡适与白话文运动的再评估·····	(251)
附录二	
从传统士庶文化的关系看二十世纪的新动向·····	(291)
征引书目 ·····	(356)
作者简历 ·····	(369)
著作目录 ·····	(370)

第一章 导 论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法国大革命象征着全然的突破和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以平等主义、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的新纪元于焉诞生。^① 公民、民众、国家的观念，取代了臣民、君王和朝代；平等、自决、博爱的主张取代了贵族、僧侣以及某些团体的自由和特权；宗教被人扬弃，理性、公意和众人的福祉成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准绳。^② 新秩序和新的价值体系似乎和传统完全割裂，历史的发展被导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但是这样的看法只透露出对法国大革命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立场，而不能真正客观地显现出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这种把法国大革命看成与传统全然断绝的崭新发展的看法早就受到

① Franc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页 2—3。

② Eugene Kamenka,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of 1789—?’” in Geoffrey Best, ed.,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Its Legacy, 1789—198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页 77。